



本真的幻象

中国论述与崛起的气氛

周云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本真的幻象

中国论述与崛起的气氛

周云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真的幻象：中国论述与崛起的氛围/周云龙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4. 6

ISBN 978 - 7 - 5426 - 4345 - 2

I. ①本… II. ①周…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081 号

本真的幻象：中国论述与崛起的氛围

著 者 / 周云龙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6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345 - 2/G · 1284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2351

致 谢

感谢福建师范大学的汪文顶先生、郑家建先生和葛桂录先生对该书出版事宜的全力支持,以及三位尊敬的师长长期以来对我的关爱、帮助和鼓励!

感谢恩师周宁先生。正是周宁先生对我的教益和鼓励,构成了本书的思考起点。我把这本小书献给周宁师。

该书共包括十四个部分,大部分内容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各部分之间难免存有些许重复、龃龉的地方,所以收入本书时,尽可能作了一些调整,以适应整本书的布局安排。其中,《对话:中国问题·中国形象·跨文化研究》主体部分最初为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分别以《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周云龙)和《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周宁)为题刊于《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第13—19页,第20—26页;《图像及其标靶:艺术资本,文化权力,与“本真性”的跨文化视觉再现》最初在“当代艺术与国家文化战略论坛”(中央美术学院主办,2012年11月24—25日,厦门鼓浪屿)上宣读了主体部分,后将原文刊于《人文国际》2013年第7辑(周宁主编,盛嘉执行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73页;《中西戏剧交流的误区与困境:“国剧运动”及其文化民族主义悖论》原刊于《中华艺术论丛》第11辑(朱恒夫、聂圣哲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346页;《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场域的“写意”戏剧观》主体部分刊于《跨文化对话》第29辑(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钱林森执行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58—464页;《〈木乃伊3〉的中国显影及其跨国消费》原刊于《文艺争鸣》2009年第7期,第149—151页;《表演“中国”:美国舞台上的中国戏剧与中国形象》主体部分分别以《差异与表述:美国戏剧中的中国形象》和《表演“中国”:美国舞台上的中国戏剧及其影响》为题,刊于《中西文化研究》(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办)2009年第2期,第62—70页,以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77—84页;《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原刊于《东南学术》2010年第3期,第104—110页;《视觉与认同:〈太太万岁〉的时空转译及其文化政治》主体部分刊于《文艺研究》2010年第11期,第98—107页;《赶超“当下”:“十七年”史剧论争的时代命题及历史根源》原刊于《人文国际》第5辑(2012年版),第

127—135 页;《〈色,戒〉的戏中戏、中年危机与文化记忆》原刊于《粤海风》2008 年第 1 期,第 53—56 页;《东方文艺复兴思潮中的梅兰芳访美演出》主体部分刊于《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第 27—33 页;《西方的“中国崛起论”:话语传统与表述脉络》主体部分刊于《国外社会科学》2012 年第 6 期,第 20—27 页;“后记”《今天的我们如何阅读“谦逊”的欧洲?》主体部分刊于《跨文化对话》第 32 辑(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钱林森执行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 217—219 页。

感谢上述刊物的主编、责任编辑给我研究的肯定鼓励和批评意见,从中我受益良多。

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彭毅文小姐及其同事们,他们辛勤而出色的工作促成了该书的顺利出版。

感谢我的研究生林雅斌、周邵丽,她们以超常的细致和耐心,协助我完成了极其繁琐的书稿整理工作。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长期以来对我工作的全力支持,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对话： 中国问题·中国形象·跨文化研究(代序)

□ 周 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 周云龙

■ 周老师,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学术研究总是分享着其所处时代的知识关切,以隐喻的方式回应时代的重大问题。您从 1990 年代中期就涉足跨文化形象学领域,思考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延续和运作的内在机制,至今已有十多个年头了。我首先关心的是:您为什么要从事这项研究?或者说,您从事的跨文化形象学背后的总体问题脉络是什么?

□ 一项研究的兴起,不是因为理论,而是因为问题。中国自 1990 年代以来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主体性的建构、中国的文化自觉。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新启蒙运动夭折之后,整个社会的主潮,无论是思想界还是普通人都转向了新左和民族主义,这一变化引起了我的系列关注和思考。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中国是否从一开始就被他者化了?在稍后的新左派思想、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新儒家等政治思潮和论述,似乎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些思潮中,我们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换句话说,它们仍然是一种背弃中国历史主体的反思。那么,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想自身?不论“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革命传统,实际上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而这种霸权真正令人生畏的是,你无法不在西方现代性框架内思想中国,除非你放弃思想。因此,我们目前面对的基本问题语境就是:如何在现代性话语中重塑中国的文化主体?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是如何建构的,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 如果说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源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那么我想首

要的问题是对自我有一种清醒而理性的认识,才有可能拥有一种自信和开放的视野,进而认识他者的智慧。理性的自我认识离不开对自身的批判与反思。可是您的研究首先思考的是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的西方中国形象,这不是距离自我的批判越来越远了吗?而且,我发现最近十多年来在国内学界兴起一股“汉学热”和“海外中国研究热”,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常常在想,我们过度地关注、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否是自身文化心理上的“自恋”的一种投射呢?如此,何以能够“文化自觉”?

□ 我同意你的观察,文化自觉的首要问题是对自我有一种清醒而理性的认识。但你有没有发现,自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自我反思始终无法离开“西方”这一巨大的参照系,我们始终都在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想中国。回避了这个残酷的事实,畅谈清醒而理性地认识自我、反思自我只能是一种很盲目的奢谈。我认为,正视我们的思想现状,思考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如何塑造了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想象才是最迫切的问题。要探讨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明确西方和其他国家、地区对中国的看法。关注西方和其他国家、地区对中国的看法在我看来不是“自恋”,而是中国走向文化自觉的第一步。至于你说的最近十多年来在国内学界兴起一股“汉学热”和“海外中国研究热”,与我涉足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在我《汉学或“汉学主义”》一文里面有详细的论述。

■ 当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的不断“恶化”,包括卷土重来的“中国威胁论”、暧昧含混的“中国崛起论”,以及最近美国重返亚洲,整个南中国海乃至印度洋周边国家试图遏制中国,还有钓鱼岛争端等问题,您是否觉得都能够从西方及非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衍变和意识形态功能中得到解释?

□ 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是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中国问题,分析世界的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地缘政治关怀。所有的研究都是隐喻,意识到研究的问题,才能看到隐喻的意义,正所谓“得预于此潮流”。美国重返亚洲,关键不在于美国的动机与作为,而在于美国的方法与效率。为什么那些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联、现实利益相关、中国努力亲善的周边国家,纷纷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敌意?除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和军事基地外,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可能更有效率,西方文化植入这些国家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为他们的政治行为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亨廷顿曾断言,冷战结束是西方内战结束,后冷战时代西方将再度续起 20 世纪一度中断的世界霸权,新世纪西方在全球化世界体系中拥有的现实与观念的霸权,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 元话语的消解和专业知识间可通约性的隐匿,决定了我们回应时代的方式只能是从“专业(知识)”进入“公共(空间)”。您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所显示的,正是一种训练有素的“专业”式研究,但背后的理论问题却是重大的,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现实的迫切性上,都是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在积极介入的。但是,其中我也发现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您的研究对于西方的中国形象宰制意义的过分强调,对于本土批判立场的忽视,在我看来最为明显,也最让我感到疑惑。

首先,过分强调西方的思想宰制意义,而忽视本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就等于承认了西方对于思想能力的垄断。其次,如果把批判的锋芒压倒性地集中于西方的文化霸权,而忽视本土的共谋因素,就为权力结构本身留下了莫大的滋长空间。您的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距离我们刚才谈及的“文化自觉”命题和诉求似乎越来越远。而且,据我个人的观察,这些问题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领域中也大量地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您的一系列研究可以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纵深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功能;然后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思考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及其世界观念体系;最后是对“跨文化形象学”观念与方法的清理、总结、深化,尝试构建其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学科范型。在我看来这三个层次是一个步步推进、逻辑严密的叙事链条。您在其中结构了一个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其链接关系是这样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处于其观念体系的核心位置,非西方在进入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时,就已经开始偏执地捕捉西方既有的中国形象,借此界定自我的主体位置。显然,这个位置已经是为全球化意识形态所建构、赋予并内化了的,非西方在对中国形象的误识中,巩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这一论述有效地衔接了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世界的中国形象之间的叙事链条,但同时又构建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形象恣意辐射的平滑空间。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您的观点事实上来自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在西方文化占据着绝对优势的现代世界观念体系中,显影中国形象的视觉结构呈金字塔形,在顶端是西方(欧美)的中国形象及其观看方式,然后是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及其观看方式;西方在这一视觉结构中居高临下,不仅向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分配有关中国形象的知识,而且给后者指派观看中国的位置和方式。这一论述思路尤其体现在您的一系列研究的第二个层次,即对诸如俄罗斯、印度与日本等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探讨上。您认为,“俄罗斯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折射,是中国映现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的他者形象。”印度也是如此,“印度的中国形象的明暗冷热,往往取决于印度的西方形象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而日本的中国形象同样陷

溺于这一视觉结构设定的观看位置：“现代日本的中国形象，始终难以超越‘脱亚入欧’的思想传统以及该传统中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问题。”

您通过对上述三个与中国邻近、关系密切的国家的中国形象的解析，提出了中国形象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的跨文化流动图式及其构成的稳固权力结构。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散播的结构性联系，昭示着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宰制性力量和跨文化霸权的过程与方式。但是，因为西方与非西方间的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您的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中被重新组装利用、因地制宜“义”的可能，同时也排除了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前现代时期与中国有频繁互动的临近国家、地区自身的中国想象传统与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的关系。

□ 我的中国形象研究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上，首先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所以重要，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

我做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最初动机，是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大问题下，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我的研究首先集中在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些大国的中国形象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他们的关系，构成 21 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他们的中国形象，构成他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在对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的研究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西方现代性精神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那就是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存在的自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这一观点也许可以解决你的质疑。

我在《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一书中一再强调这个问题：“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强大的形塑力。这种形塑力的来源是根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两种相互关联的核心力量：一是自我认同，二是异己分化。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力不仅表现在西方文化内部趋向凝聚，还表现在西方文化面对非西方文化不断施展的向心性的吸引力。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在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注意到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这些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另一个方面，在强化自我认同的同时，也在进行异己分化，在西方现代性的

全球化推进过程中,所到之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已有的文化结构,纷纷出现难以弥合的断裂冲突,当今社会误解与冲突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是前现代社会曾经构成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区域。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曾经共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曾经共享佛教文化的中国与印度,他们在进入现代性世界秩序后对中国形象表现出的强烈的否定态度,是最好的明证。”

■ 虽然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现代性想象中的中国形象,但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性与自身的传统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亲缘关系。西方的现代思想也是西方的传统文化在与非西方的文化互动中形成的。现代性虽然源自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西方的现代性想象永远都是“西方”血统的。在从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转向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形象的想象主体也随之变化了。因此,虽然您的研究对象看上去仍然是“中国形象”,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它早已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即从西方转向了非西方。

在现代性的世界观念体系中,观看中国的方式是从西方向非西方、由金字塔顶向底端无阻力地转移与宰制,这一预设使您的论述步伐似乎未能与研究对象的转变保持一致:当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非西方的视野并介入其文化结构时,您的研究却没有随之紧紧跟进非西方的文化历史之中,而是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地处理。您这时候真正关注的是进入非西方的西方中国形象,而不是西方中国形象如何进入了非西方。换句话说,研究对象应该转变为非西方国家或地区时,您却无意识地仍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论述逻辑与研究对象之间发生了错位。于是,我在您的研究中就看到了这一幕:一种无重力的西方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所向披靡,自由自在地飞了一圈之后仍然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从未与本土接触,没有变异,也没有互动。借用您的说法,就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似乎既是起点又是终点。”

您的一系列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环环相扣的论述结构本身就暗示了西方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线路图,在这条线路图中,既可以隐约看到黑格尔式的历史因果链,也能够感受到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对象之间那种无意识的共谋。从这个意义上说,您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在方法论上则体现出一种民族主义式的历史地理学倾向。

□ 你的理解没错,我对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关注的问题的确是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扩张实现其文化霸权。正如我一再说明的,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扩张,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

的中国叙事。这样,我研究世界不同区域、国家的中国形象,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成为: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西方话语霸权的实现方式。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强烈意识到的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那种强大的形塑力,其中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同时进行,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离。这种力量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观念秩序,也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现实秩序。

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甚至文化软实力的诸多困境,与西方现代性的这种“形塑力”密切相关。这是笔者思考的“问题”所在。但是,关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中表现的西方文化霸权,并非等于否定各自国家中国想象的本土资源以及本土资源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改造。每个国家的现代性自我想象的问题背景不同,其“利用”中国形象的方式与意义也不同,被西方宰制的非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他们有自己的语境,而且各自不同。你所谓的“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中被重新组装利用、因地制宜”的过程,是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本土中国形象西方化共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尽管不是笔者“问题视域”中关注的焦点,却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 这里我想以您发表在《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上的论文《“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为例,对我刚才所说的您的研究对象错置问题加以细述。在这篇长文中,您关注的是“日本现代想象中的‘中国’”。其中的“现代”很重要,正是这个“现代”,您就可以接着子安宣邦的论述把“西方”这个“巨大的他者”提出来讨论,同时,“脱亚入欧”也构成了该文讨论日本的中国形象的开端,因为这一思想中暗含着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深层危机。鉴于日本与中国在历史地理政治上的亲缘性,我觉得讨论“脱亚入欧”思想中的中国形象,不仅要面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同时还必须留意此前的日本中国形象。

您似乎对这个问题,特别是“脱华”与“脱亚”的关系也很敏感,在具体论述中,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您对从“脱华”到“脱亚”的过程描述:“适逢西方文化传入,日本终于落实了‘脱华’之后的去处,那就是‘入欧’。从伊比利亚扩张到鸦片战争,动摇了日本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从‘兰学’到‘西学’,逐渐树立起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现代日本在中西文化之间权衡,最终确立去中就西的文化取向。”“脱亚”的意义在于为“脱华”提供了现代意义和暂时的去向,也就是现代化/西化和“入欧”。但这是一个结论,或者说是一个预设,而不是论证。因为在您所描述的日本对于西方的接纳过程中,带有“照单全收”的意味,那么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日本的中国形象将自然而然地“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沿着这一前提预设引导出的推论方向,“‘脱亚’之后‘入欧’,现代日本选择放弃华夏中

心的东亚文化圈,开始自觉地归附西方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从此,日本不论看待自身,还是自身的他者——中华帝国,都自觉地以西方为尺度。”

由此,现代日本的中国形象完全可以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等量代换。在接下去的研究中,我看到的仍然是西方或西方的中国形象,而日本则一直是透明、沉默的。如果说“‘脱亚’是明治时代的新提法,而‘脱华’思想却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那么,“脱亚”与“脱华”遭遇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如果说现代日本在“脱亚入欧”的思想中接受了西方的中国形象,那么“脱华”思想中的中国形象是如何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关系的?二者在日本的现代性自我认同过程中是如何对接的呢?日本的现代性想象资源来自西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的传统是如何被转变为“现代”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是否存在着一个可以作整体化处理的“西方”与“日本(或非西方)”呢?事实上,我觉得这些问题才是研究“日本现代的中国形象”的关键所在。

□ 我的研究并非否认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本土资源。“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形象,既是“西方化”的产物,又是“反西方化”的产物。我使用的“俄罗斯思想”是有特殊意义的,指与现代俄罗斯文化自觉的相关思想,它建立在俄罗斯民族性基础上,关注诸如俄罗斯现代文化的自我确认、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历史使命、俄罗斯传统与民族独特性等问题,其极端化表现是俄罗斯思想史上带引号的专有名词“俄罗斯思想”,特指现代俄罗斯文化自觉时代的有关俄罗斯历史使命与命运的思想。这种思想起于俄罗斯民族天选独特性的意识,终于全人类统一于俄罗斯的“神人类”理想。日本的情况更典型,朝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历史遗产,使日本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想象中国的方式,不仅与西方不同,与其他非西方其他国家也不同。“脱亚入欧”是日本特有的想象中国的方式,与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性格以及其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印度的中国形象的建构与演变,更取决于印度现代性自我认同或身份想象的特殊性,骄傲的印度文明历史与屈辱的殖民地经验,是现实政治冲突之外更深层的、促成印度的中国形象剧烈转变的原因。你虽然注意到笔者强调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中西方的跨文化霸权问题,却忽略了我相应层面的论述,即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国家实现文化霸权的意义与形式,会因不同国家的本土问题的差异而不同,其中不同国家或背叛或封存各自前现代的中国形象遗产,但这种遗产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他们的现代性自我想象与这种想象体系中的中国形象。

我研究的问题是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表现的西方话语霸权,但研究的问题不同于研究的对象,上述三个国家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只是本研究的对象。西方现代性主导下世界观念体

系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与一般国别中国形象研究的问题不同,一般的国别中国形象研究,可能只是描述分析特定国家的中国形象如何,甚至可能在研究中根本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我从后殖民后冷战角度分析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才是思考的“问题”。在我的问题视野中,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是作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现的,表现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网络或体系中的西方霸权,才是问题的核心。你所指出的,我的研究虽然从西方的中国形象转向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但还是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这一理解是准确的。我的研究始终关注的是“西方”问题,第一步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精神结构中如何形成;第二步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如何扩张。至于你质疑我置换了研究对象,我感觉有必要说明,研究对象不同于研究问题,我的研究对象是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而研究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中的西方霸权”。

西方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表述,这一点不论在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都表现得非常充分;这些地区或国家的中国形象,既意味着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隐喻着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个特定的、纠缠不清的、危险的三角关系。

■ 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地处理的方式,使我想起了 Martin W. Lewis 和 Kären E. Wigen 在 1997 年发表的专著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中批评的“元地理学”(metageography)思想。他们指出,“元地理学”是一整套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空间结构,在这些地理“常识”背后,往往潜藏着一个隐形的空间秩序,进而形塑人类的空间想象,并构建出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以西方为中心的元地理学知识不但发挥着宏观层面的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在微观层面也调动了人类对自身事务的所有全球性关照。这套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空间结构和地理学框架操控着包括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是博物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知识构建出了三种彼此关联概念,即大陆体系、民族国家、东方与西方。事实上,您作整体化处理的“非西方”也潜在地包含着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它对应着“西方”,并且和“西方”一起构成了您研究中的基本的,也是巨大而粗糙的分析单位。您虽然讨论了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家的中国形象,但事实上它们均为“非西方”的代名词。如此,如何能够揭示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所隐藏的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您的分析框架已经在这个结构之中了。

您的系列研究中暗含着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它与西方中国形象进

人非西方世界的无阻力方式相辅相成。我想在您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另一种不同的诠释脉络,把论述的侧重点放置在对“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翻译上,也许这样既可以补充又可能深化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相关的理论思考。

本雅明在讨论“翻译者的任务”时指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将面临着“信”与“自由”的两难处境,“即忠实地再生产意义的自由,并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忠实于原义”,只有如此才能同时给予翻译者和原义发声的空间,因此,原文与译文的差异就成为必须,而原文也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被“更充分地照耀”。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本身源自西方与中国文化的碰撞、混杂,如今已然构成了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部分具有混杂性的西方思想(中国形象)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遭遇,必定会因为本土的引力而被因地制宜,导致其再混杂。这样的跨文化实践必定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原文”及其附带的权力格局带来意义上的爆破,而不仅仅是西方中国形象的单向宰制,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里我仍然以中国形象的世界性散播为例,就跨文化研究的观念与方法问题在两个层面上加以延伸和讨论。

首先,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它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资源或理论观念,其中的跨文化翻译过程尤其重要。该过程需要调动翻译者/非西方世界既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做出本土化的诠释,而不会是任其在既有的知识语境中自由驰骋。这个过程事实上带出了一个过渡性的、动态的、双向的跨文化对话空间,当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这一空间,再走出这一空间时,就已经不再是西方的中国形象,而是非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对话后的产物了。

西方的中国形象,无论是邪恶的,还是美好的,这“两种东方主义”话语在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情势下,都有可能被运用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批判性资源。比如,在中国“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借用西方的中国论述建构本土“西方主义”话语,对抗具有压抑性的传统文化符码系统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批判性思想资源就暗含着解放性意义。其中对于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挪用和自我批判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既非完全的宰制与被宰制、亦非绝无关联。相反,这种西方中国形象的本土化带出了一个中西方文化的交叉地带,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此间就失去了平滑散播的可能,所谓的“宰制/被宰制”关系也会失去其确定性,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论述框架也会随之松动,混杂、重叠、并置、关联与流动就成为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按照这样的诠释脉络,西方的中国形象、非西方的中国形象(包括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想象),或者说是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网络的论述就不应该是一个层层推进的推导式结构,而应该是一种充满了种种回旋犹疑、协商对话的松散场域。这一场域才真正构成了跨文化操作的空间和

该项研究的对象。在这个场域中、在这个过渡性的混杂空间中,您的系列研究的三个论述层次,完全可以不分先后、松散并置地加以论述。换句话说,在三个层次上分别讨论的问题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可以在任何一个层次上开启并介入另一个层次的讨论。

□ 你提出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翻译”,是个有见解有价值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它虽然不在我的“问题视域”中,但不能否认其理论意义。“跨文化翻译”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拓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也做过相应的思考,只是这个问题不是我的“要点”。“跨文化翻译”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第二阶段关注的问题,第一阶段他们强调西方文化霸权的展现,第二阶段矫枉过正,他们开始强调本土力量的参与、协商与抵抗。但在我看来,这种理论推进的价值取向是可嘉的,但实际论证结果却是可疑的。因为强调非西方世界本土资源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与协调,起点可能是对立的,但终点却是妥协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经过改造与重组,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意义特征与价值取向。当今全球化文明格局中,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危险的事实是,即使是某些在政治观念与文化价值上与西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国家,其中国形象也在复制西方的。

我曾提出跨文化形象学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

这三组课题的问题相互关联,第三组问题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之间的冲突、协商、妥协与互塑问题,将是一个核心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可以启发我研究的“终极关怀”,即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的方向与方法。

你提到的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第二阶段讨论的本土资源的“跨文化翻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我的研究计划中,它是“第三组问题”中的一个要点。现代中国在进入西方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同时,也进入西方中心的世界观念体系。现代中国在西方的镜像面前确认自我,西方既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压力与欲望对象,又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幻象。现代中国不断从这个虚幻的他者镜像中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与其说是确认,不如说是误认。西方中心的世界观念体系的核心,是西方现代性思想围绕着进步、自由、文

明等概念构筑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宏大叙事系统中,在特定的中西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想象域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也就可能成为自我异化的过程。于是,必然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思想延伸线上的问题,就是所谓“欧美眼中的亚洲形象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人自己眼中的亚洲形象的一部分的”“自我东方化”问题。

第三组课题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支配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形象的同时,也支配着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西方现代性想象正是通过中国现代思想转换成现代中国反思历史、改造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视域与问题框架。繁荣与进步、自由与民主、启蒙与文明、民主主义或民族主义、革命或保守,等等,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与方法,都变成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复制或变体。解构跨文化的中国形象,必然延伸到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自我形象的回馈性影响问题上,揭示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所隐藏的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危险与诱惑。从停滞衰退、东方专制、野蛮半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到剧烈变革、动荡危险的现代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在话语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多义性。但是,变化的是中国形象的特征,不变的是构筑中国形象的、存在于西方现代性内在逻辑中的、具有历史连续性活力的话语构成原则。在这种文化霸权中,现代中国看得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却看不到现代化的未来前景;似乎为中国找到了现代文化身份,但这个现代文化身份是否是中国的,依旧可疑。

你思考的有关跨文化翻译与跨文化形象建构的公共场域的研究,可能推进本人设想的跨文化形象学第三组课题的研究,并有可能推进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本身的发展。但我强调“跨文化翻译”,是否是一种自我解嘲的“共谋”?承认非西方世界在自我形象建构过程中有限的自主性“份额”,并不能回避西方文化的主导话语势力。就理论本身而言,重要的不是本人是否关注“跨文化翻译”,而是这种理论是否针对“问题意识”,是否对我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所启发。我觉得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真正困境在于,单纯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可能“解构”陷害非西方世界现代性身份的后殖民主义观念体系,但却不能把非西方世界从后殖民主义文化陷阱中“解放”出来;强调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的跨文化建构,难道就能拯救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文化主体吗?我不怀疑其价值,却怀疑其方法,这种怀疑甚至可能危及本人一贯尝试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及其相关研究。

■ 抱歉,我的质疑并不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出发,而是从您的理论

前提的检讨开始的;而且,我本人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中国语境的合法性问题也持怀疑态度,正如我一开始就提出的,如果把批判的锋芒压倒性地集中于西方的文化霸权,而忽视本土的共谋因素,就为权力结构本身留下了莫大的滋长空间。

您在跨文化形象学一系列研究中暗示出来的论述结构,很容易让人想起爱德华·W. 萨义德在其著名的论文《旅行的理论》中的观点。萨义德指出,“观念与理论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时,存在着一些特别有意味的情形,正如东方所谓的先验观念在 19 世纪早期被移植到欧洲,或者是某些欧洲的社会观念在 19 世纪晚期传到东方的传统社会中去那样。但观念传播到一个新的语境中的路途从来都不是畅通无阻的。它必定包括一些与观念在源点处有所不同的表述和制度化程序。这一事实致使任何关于理论与观念的移植、迁移、传播和流通的解释都变得复杂化了。”萨义德同样为这种理论与观念的“旅行”绘制了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图式(pattern):“首先,存在着一个源点,或者近似源点的一系列初始情境,观念藉此可以生成或者进入话语程序。接着,存在着一个观念移植的距离,这就是观念从一个先前的起点到达另一个可以让自身获得新的意义光辉的时空中时,要经历的来自种种语境的压力的通道。然后,存在着一种情境——可以称之为接受语境,或者是作为接受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抵制的语境——这种情境遭遇了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使之引进或接受成为可能,无论彼此间是多么地不相容。最后,如今完全(或部分)被相容(或合并)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其新的用法及其所在的新时空中的位置给转变了。”

萨义德对于观念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旅行”的程序与图式的论述,很有可能把非西方的跨文化研究导向两个误区和危险。第一,这种做法将大大简化观念在不同语境中流动的复杂性,把西方的某种观念单纯地视为一种所向披靡的权力话语,它将支配并型塑其他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图式。如此,非西方世界就成为被西方的文化霸权主宰的沉默地带,非西方世界的自我表述传统与“能动性”则被屏蔽在批判的激情之外。在深层次上,这种论述正是对西方思想宰制能力的承认。以非西方代言人的身份致力于解构、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事实上颠倒地复制了“东方主义”式的霸权思维方式,并与其批判的对象达成了深刻的共谋。第二,这种做法将会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放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自我批判立场,转而美化对西方的对抗。

在您的知识立场上,如果说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性表述,那么,作为表述主体的“西方”,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内,在与非西方世界发生意义关联时,很可能也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在假设“中国”是西方的文化他者的同时,忽视“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我认同的镜像意